

文化守望

冯天瑜 著

史学五种（一）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文化守望

冯天瑜 著

史学五种（一）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守望/冯天瑜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5
名家学术
ISBN 7-307-05035-8

I. 文… II. 冯… III. 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1992 号

责任编辑: 王雅红 陶洪蕴 责任校对: 刘 欣 版式设计: 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80 1/16 印张: 31.875 字数: 458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5035-8/G · 817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史学五种”前记

承蒙武汉大学出版社美意，笔者得以从近二十余年由多家出版社印行的习作中选编五种(《文化守望》、《中华元典精神》、《辛亥武昌首义史》、《“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 1862 年的中国观察》、《“封建”考论》)，合为“史学五种”，奉献给读者诸君。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我国人文学界沿袭章太炎、梁启超、梁漱溟、柳诒徵、钱穆诸先哲在“后五四”时期草创文化学及文化史学的余绪，借鉴海外前沿成果，发掘中国文化的丰厚资源，展开文化学及文化史诸论题研讨，构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与此间展开的热烈文化讨论相为表里，不少学人潜心撰构，文化哲学、文化通史、断代文化史、区域文化史、各种文化专题的论著如雨后春笋，竞相生发，对于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发展脉络及走势、中外文化交互关系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哲思，在深度与广度上均大有拓展。笔者躬逢其盛，追随前辈、时贤，见证并参与这一方兴未艾的学术建设过程，勉力充任一个未敢懈怠的施工匠人。

二十余年来，笔者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对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有所议及，陈述于《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月华集》、《人文论衡》等几种论文集和《中华文化史》上篇之中，今次择其要者，汇成《文化守望》一册。

笔者考析中国文化演绎史，注目于“生成”与“转型”两个环节，故用心于晚周、晚清两个关键时段。“晚周”是中华文化生成的“轴心时代”，此间形成深刻影响我们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经典，笔者拟名“元典”，试图探索中华元典的形成及诠释过程。“晚清”是



中华文化古典形态终结及近代转型时期，是我始终不渝的关注重点及学术研究的展开部。在晚清文化研习中，力辟直线进化观和西方中心论，考究发生于明清间以“复归元典”为外显形态，以螺旋上升为运动方式的“文化重演律”。这些尝试性议论，集结于《中华元典精神》一册。

任何一种文化均受惠并受制于特定空间提供的生态环境，文化研究理当彰显地域特征，这是把握文化“一”与“多”、共性与个性相统一所必需的劳作。笔者鄂籍，二十余年来一直参与湖北省地方志、武汉市地方志的修纂，并倾力于辛亥武昌首义史及张之洞研究，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广采乡邦文献，详考切关宏旨的首义史事细节，又适度使用访录辛亥老人的材料，这正是现今开始盛行的“口述史学”的早期尝试。

1998年以来，笔者有近五年时间在日本讲学并从事研究，得以与多国汉学家论难究学，并潜心开掘异域史料，努力演运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三条做法之两条——“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由此进行中、西、日文化比较，将社会转型研究向深广处拓展。《“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为这方面的结集。

考察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是笔者长期以来的用心所在，近年来更设立专题，详加研习，曾通过对“几何”、“上帝”、“革命”、“共和”、“科学”、“文化”等核心术语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别是清民之际中、西、日文化交会间的思想因革状态。今次收入的《“封建”考论》，用力于“知识考古”，探究“封建”的本义（古义）、“西义”（世界通用义）、马克思封建原论，揭示现代中国流行的泛化封建观的弊端，并提出改订建议，试图为聚讼未决的中国历史分期提供较稳妥的观察视角和较精确的概念坐标。

冯天瑜

2006年4月6日于武昌珞珈山麓



目 录

第一章 关键词诠释.....	1
一、中国.....	1
二、中华民族.....	8
三、人文	15
四、文化·文明	20
五、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	28
第二章 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37
一、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	38
二、中国文化特质	47
三、中国文化的地位	50
四、中国文化史分期	53
五、中国文化的地域展开	62
六、中国文化现代转型	66
（附）中国文化转型要旨	
——冯天瑜教授访谈录	72
第三章 中外文化交融互摄	79
一、从“前文明”、“诸文明”到“普世文明”	79
二、“开放”释义	81
三、走出“原始封闭”	83
四、华夷相交 列国沟通	86
五、“胡服骑射”与《谏逐客书》的内蕴	90



六、筑城“自守”与“勤远略”	94
七、军事外交与商路开辟	101
八、汉胡交融的积极效应	105
九、宗教职业者与文化传播	107
十、纳佛·斥佛·儒佛交融	109
十一、郑和下西洋：卓越成就与历史遗憾	112
十二、双向互动：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	115
十三、马嘎尔尼使团来华：聋子间的对话	117
十四、从闭关锁国到门户被动开启	120
十五、睁眼看世界	121
十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与驻外使节派遣	124
十七、向西方求真理·以俄为师	127
十八、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28
十九、全方位自主开放及其显著实绩	130
（附）“文明冲突论”辨析	132
 第四章 中国文化的经世传统	141
一、儒学经世	141
二、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	161
三、孔子“重政务、斥技艺”思想评议	180
 第五章 中国传统智力论	195
一、智力界说	196
二、智与德	199
三、才能与知识	200
四、智力与先天素质	201
五、智力与“习染”	203
六、智力与“好学”、“敏求”	204
七、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对智力发展的影响	206
八、智力结构诸侧面	207



九、智力培养的方法和途径·····	214
十、师承与智力传递发展·····	217
十一、智力的检验与测验·····	219
（附）中国古人的发明与发现·····	219
第六章 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	227
一、“新学”与“西学”是两个有着内在联系 而又并不同一的概念·····	227
二、中国文化在明清之际出现了由“古学” 走向“新学”的初兆·····	229
三、早期启蒙文化在清中叶的 沉寂和在清末叶的复苏·····	239
四、近代新学对早期启蒙文化的继承和发挥·····	248
第七章 利徐之学探略·····	259
一、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	259
二、徐光启的学术路线·····	278
三、利玛窦翻译西洋术语的首创之功·····	293
第八章 黄顾王文化哲学探略·····	317
一、从晚周民本思潮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317
二、《明夷待访录》题义诠释·····	347
三、顾炎武文化思想初探·····	354
四、王夫之理性主义历史观探微·····	373
五、王夫之创见四题·····	397
第九章 晚清学术片论·····	426
一、道咸经世派的“开眼看世界”·····	426
二、“变易”与“不易”的二律背反 ——洋务派“变法”观评议·····	439



三、张之洞：洋务运动的终结人物·····	447
四、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 ——从巫觋、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449
第十章 东方智慧与现代文明·····	465
一、向历史请教·····	465
二、异彩纷呈的 20 世纪·····	466
三、现代化：一柄善恶并举、苦乐同行的“双刃剑”·····	468
四、盛世危言：现代病初诊·····	469
五、东方智慧与现代病疗治·····	475
六、对东亚智慧现世意义应持平允态度·····	482
七、东西文明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489
回眸学术理路·····	492
一、博览·庭训·抉择·····	492
二、义理·考据·词章·····	497
三、贯穿古今与打通中西·····	501



第一章 关键词诠释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这片丰美的大地上久历岁时的卓越创造。如果将中国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中国”便是演出舞台，“中华民族”是演出主体，“人文化成”的“文化”是演出内容。中国文化的守望者，应当了解舞台、主体和内容。

“中国”、“民族”、“人文”、“文化”、“文明”都是汉语古典词，其内涵在近现代发生了深刻演变。这种演变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汇的产物，诚如陈寅恪 1936 年在《致沈兼士》中所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对“中国”、“文化”等关键词进行深度探讨，是研习中国文化史的入门之径。

一、中 国

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中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其内涵却经历了曲折的流变：从古代的“天下中心”之名，演变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均像“有旒之旌”（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尚无此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及“國”字，指城邑。《说文》：“邑，國也，从口”，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口”（音围）表示城垣，其



内的“戈”表示武装，引申为武装保卫的天子之都，以及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综论之，“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与“外”对应；“国”指执戈捍卫之城，进而指称军事、政治中心地。“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①、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②均有用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云：“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这些用例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刘熙为《孟子》作注所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初义京师的“中国”又有多种引申，一如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③；二如国境之内^④；三如中等之国^⑤；四如中央之国^⑥，等等。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列邦之义的“中国”，如《诗·小雅·六月·序》论及春秋时期的形势说：“《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此“中国”指华夏族在中原地区所建之国。《庄子·田子方》“吾闻中国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韩非子·孤愤》“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两例“中国”亦指华夏族

① 《何尊》记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参见于省吾《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③ 《诗·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④ 《诗·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炁然于中国，敛怨以为德。”《穀梁传·昭公三十年》注：“‘中国’，犹国中也。”

⑤ 《管子》按大小排列，将国家分为王国、敌国、中国、小国。

⑥ 《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



在中原所建国家。三国时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①唐朝的韩愈在《论佛骨表》中云：“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②这些“中国”，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域、中区、中夏、中华”等等。

古人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所谓“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③，作“回”字状向外逐层延展，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在春秋时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但后来这些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战国时齐人邹衍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一小部分，“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邹衍提出“中国”的地望：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④

邹衍所谓“中国”，即“赤县神州”，包括《禹贡》所列“九州”，有小海环绕；而在“中国”之外，还有与之相类似的大区域九个，有大海环绕。这是中国古代较宏阔的“中国”观与“天下”观。

①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②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8页。

③ “五服”见《国语·周语》，“九服”见《周礼·夏官·职方氏》。

④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扩展至长城以南、临洮（属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汉书·西域传》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拓宽。

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含义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战国时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

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①

与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长处，如“胡服骑射”便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这又给“中国”的文化含义赋予了某种开放色彩。

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②。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诚如《思问录·外篇》所说：“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

秦汉帝国建立后，“中国”领域放大，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历代中国王朝版图多有伸缩，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奠定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极库页岛，约1260万平方公里。19世纪

^① 《史记》卷43《赵世家》。

^② 韩愈：《原道》，引自《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2页。



中叶以后，西东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才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陆地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1707 万平方公里）、加拿大（997 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汉、唐）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江户时称中国人为“明人”、“清人”。印度称中国为“支那”，意谓“文物之国”；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赛里丝”，意谓“丝国”。

以“中国”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该记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西域传》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大秦寺》以“中国”与“波斯”（伊朗）、“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以后并不多见。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①。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着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赋关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赵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了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这已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还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

^① 《元史》卷 208《外夷传一》。



晰的国体意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北宋理学家石介著《中国论》，此为首次出现的以“中国”作题的文章，该文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这已经有了国家疆界的分野，没有继续陶醉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虚幻情景之中，“中国”便从文化主义的词语，变为接近国体意义的词语。当然，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的。

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一俄之间。沙皇俄国以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时（1662~1722）的清朝军队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相对应的国名。

如果说，17世纪末叶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那么，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拟谕英吉利国王檄》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以“中国”与“外国”对举。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致英帅书》，称自国为“中国”，与“大英”、“贵国”对应，文中有“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之类句式；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发布的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自极西边来”的“英吉



利国”相对应，文中多次出现“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①等名目。而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②。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③。

古代中原人常在“居天下之中”意义上称自国为“中国”，但也有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曾西行印度的东晋高僧法显说，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一带居于大地中央，称之为“中国”^④，中国的佛徒把恒河中游一带的印度译作“中国”（Madhyadesa）。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改变了部分士人的中央意识，使之省悟到“中国”仅为世界的一小部分，“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戈戈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⑤。清人魏源接触到更翔实的世界地理知识，认识到：“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⑥近代学人皮嘉佑在《醒世歌》中说：“若把地球来参详，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这都是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

①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445、450页。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33页。

③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1~57页。

④ 法显：《佛国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页。

⑤ 瞿式谷：《职方外纪小言》。

⑥ 《海国图志》卷74。

修正。

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当然被朝野所袭用。梁启超、汪康年等力主，应当扬弃“中国者，天下之中也”的妄见，但“中国”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国民精神。他们指出，以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是世界通则，西洋、东洋皆不乏其例^①。而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②，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这已经成为国民共识。如果说，“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国名，交替使用，那么，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便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

本书在全面观照“中国”的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的基础上，使用“中国”一词。“中国文化史”正是在作为历史范畴的“中国”这一逐步扩展并定位的空间，得以生发、演绎的。

二、中华民族

在中国这片广袤、丰腴的大地上生活劳作的各族人民，统称中华

^①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汪诒年编《汪穉卿先生遗文》：“吾国古来自称中国，对于四夷言之也。……盖名称之源于古者，或不免有所错误，而承袭既久，安能革之。即西人之各种名称，似此者多矣。安能一一革之乎。又如日本二字，今日核之于理，岂有当乎。”杭州汪氏1938年版，第13页。

^②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4月）。